

【学者谈治学】

走向学者之路的学术五步曲*

陈文忠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 人文学科;学者的培养;学术五部曲

摘要: 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思想和文化影响的人文学者,是每个有志向学的科研工作者的愿望和终身追求。从前辈学者的学术经历看,人文学者的培养大凡要经历五个阶段:进入一个领域,抓住一位大家,精读一部经典著作,钻透一个问题,形成双重能力。五个阶段环环相扣,互为前提,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如果能严格遵循上述步骤进行学术训练,那么一个创造性的学术课题完成之日,便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文学者诞生之时。

中图分类号: G3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2-0246-15

Five Steps for Cultivating Scholar

CHEN Wen-zhong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Poetic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humanitie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cholars; five steps of academic

Abstract: Becoming a humanist with creative thought and cultural influence is the inner desire and pursuit for life of every ambitious humanities researchers. From the senior scholar's academic experienc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humanities scholars generally has five stages: entering a new field, grasping a great master, reading intensively a classical works, drilling through a problem, taking shape double ability. The above five steps are interlocking, premising each other, deepening step by step. If an ambitious humanities academic graduate student can strictly follow the above steps, then a creative academic issue is completed, when is the birth of a distinct personality humanist.

引言：“学术五步曲”

何谓人文学者？一言以蔽之，即以崇高的人文情怀，自觉的人文使命，传承人文传统，传播人文理想，把塑造民族的人文性格和升华时代的人文精神作为终身使命的知识分子。古圣有曰：“士志于道。”“道”者，真理之谓也。人文学者就是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献身真理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阐述“学者的使命”时，自豪地写道：

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

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因此，就我们迄今所阐明的学者概念来说，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1]

作为“人类的教师”或“人类的教养员”，每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无不具有独立的精神、崇高的理想、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庄严的文化使命感，以奉献出具有深厚学养、精深思想、隽永智慧和诚挚人文情怀的作品，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学者的荣誉。而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思维和文化影响的人文学者，正是每一个有志向的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内心愿望和终身追求，也是导师的殷切期

*收稿日期：2014-01-15

作者简介：陈文忠(1952-)，男，上海市人，教授，研究方向：美学与文艺学。

引用格式：陈文忠. 走向学者之路的学术五步曲[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246-260.

望和学术培养的最终目标。

然而，从学生到学者，从一般学者到有成就的学者，谈何容易！走向学者之路，是一条崎岖曲折的精神之路。不过，如果说艺术是天才的事业，艺术家更多地凭先天禀赋；那么学术是长期的积累，学者主要靠后天的学养。因此，走向学者之路，又不是一条无章可循的神秘之路。每一个成功学者的学术自述，都昭示了一条独特而富于启示意义的“学者之路”。从王国维的《三十自序》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自序》，从王元化的《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到傅伟勋的《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到孙康宜的《叩问经典的学旅》，凡是在史学、哲学、文学诸领域富有成就的学者的学术自述，无不以生动的学术经历，展示出他们一步步走向学者的心路历程，一步步地达到学术创造的艰难旅程。“研究旁人的创造发明方法是成为成功的创造者的前提。”^{[2]610}这是莱布尼兹总结的一条学术原则。确实，如果一个成功的学者如实地告诉了我们他们学术研究的历史，真诚地告诉了我们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取得自己的学术成就的，我们就能够从中把这些步骤探求出来。

罗家伦曾说：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确实，自然科学家诞生于“实验室”，人文学者则起步于“图书馆”。那么，起步于“图书馆”的人文学者，学术培养的途径究竟是怎样的？从著名学者的学术经历和他们取得学术成就的历史看，大凡要经历五个阶段或五个步骤，不妨称为走向学者之路的“学术五步曲”：进入一个领域，抓住一位大家，精读一部经典，钻透一个问题，形成双重能力。这五步环环相扣，互为前提，循序渐进，层层深入。一个有志向的人文学科研究生，如果能严格遵循上述步骤，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训练，那么一个创造性的学术课题完成之日，便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文学者诞生之时。

进入一个领域：确立学术基地，获得学者身份

请从老年歌德对一位青年学人的忠告说起。1824年12月3日，爱克曼兴冲冲地告诉歌德，他准备接受一个邀约，替一家英国期刊撰写德国散文的每月短评，条件很优厚。歌德听后却并不

赞成，明确要他“拒绝接受这项任务”。为什么呢？歌德说：

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是积累取之不尽的资本。你现在已经开始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学。你从这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资本。你应该在像英国文学那样卓越的文学中抓住一个牢固的据点……在英国文学中打下坚实基础，把精力集中在有价值的东西上面，把一切对你没有好处和对你不相宜的东西都抛开。^{[3]48-49}

爱克曼因自己能引发歌德说出这番话，感到很高兴，并决心照歌德的教诲做。

所谓“在卓越的文学中抓住一个牢固的据点”，就是“进入一个领域”，这对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具有普遍意义。具体地说，它应是指在自己从事的学科中，进入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领域，这一历史领域应当独立完整、长短适度、具有学术史上的重要性或“卓越性”。在人类学术文化史上，像亚里斯多德、黑格尔、朱熹、王国维那样留下“包罗万象”著作体系的哲人和学人，可谓绝无仅有。近代以来，随着学科的分化和深化，学者们无不具有自己的学术领域，以此建立学术基地，获得独特的学术身份。

（一）为什么要进入“一个领域”？

首先，这是“不得已之事”。学海无涯而人生有限，每一个现代学者只能在某一学科的某一领域中发挥才智，做出贡献。钱锺书曾这样感慨：“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4]113}

其次，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学术探索。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我们必须做的是试图重新加以再思考而已。人文学科的每一个领域无不如此。面对前人留下的浩瀚文献和丰富积累，只有“进入一个领域”，进入某一学科的某一领域，才可能从容梳理，系统研究，深入地再思考，从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得之见。

20世纪以来，我国作出卓越成就的人文学者，除极少数像王国维这样的学术通才，大都在“一个领域”中确立学术基地，获得学者身份，做出学术贡献。郭沫若是先秦古代史家，陈寅恪

是隋唐史家,鲁迅是小说史家,吴梅是戏曲史家,冯友兰、张岱年是中国哲学史家,郭绍虞、罗根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家,胡适、俞平伯是新红学家,夏承焘、唐圭璋是词学家。尽管许多学者“一专多能”,但真正做出重大学术贡献,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无不是其进入而又深入的那个“专业领域”。中国学人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虽多无用);得门而入,事半功倍”。^①西方哲人说:“每个地方都去,等于哪里也不去。”^②其理如一。

(二) 为什么要进入一个“历史领域”?

首先,“论从史出”。历史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历史的诠释。缺乏系统深厚的历史素养,绝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理论洞见。关于历史与理论的辩证关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史可以作为艺术理论的基础……没有事物的历史也就没有事物的理论”^{[5]181-182}。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的美学观持批评态度,但他的这一看法,与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哲学史”^③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现代美学家邓以蛰所谓“画史即画学”^④的说法,则是黑格尔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概言之,只有先成为思想史家,才可能成为思想家。

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原创诗学基于基础文类”的观点,与“论从史出”,可谓异曲同工而更进一解。他在《比较诗学》中写道:

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揭开一个不甚大的秘密,西方诗学是亚里斯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他当年是以荷马史诗和希腊抒情诗为基础,那么他的诗学可能就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了。^[6]

厄尔·迈纳的命题蕴涵丰富的学术意义。在此他明确告诉我们,一种诗学基于一种诗体,只有深入一种诗史,才可能理解一种诗学,也才可能创立一种诗学。

其次,历史蕴藏着未来。历史凝聚了过去,也指示着未来;历史曾是无数前辈“未来”的结晶,今人的未来就潜藏在历史之中。西塞罗说:“如果你对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你永远幼稚的人。”为什么?人类追求未来,为未来而奋斗。然而,“未来”者,尚未来到也,所以只能询问历史。《管子·形势》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这段话深刻阐述了历史的“未来性”。确实,历史是无数“未来”的结晶:它是无数前辈理想的浓缩,是无数前辈智慧的结晶,是代代相传的文明的升华。割断了传统,失去了历史,我们将一无所有。因此,历史是教育的核心;历史是人文学科的学术基础,也是人文学者的基本素养。“论从史出”的更深层的根源,正蕴藏于“历史的未来性”之中。

(三) 怎样进入一个历史领域?

所谓“进入一个历史领域”,就是在你从事的学科中,“抓住一个牢固的据点”,建立一个学术基地。那么怎样进入一个历史领域?如何才算“抓住一个牢固的据点”?建立自己学术基地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简言之,既要细读历史著作,达到“面”的把握;又要阅读学术原典,做到“点”的深入。张世英当年关于西哲史研究生“先打点基础”的建议,对人文学科研究生具有普遍的教益。^[7]

关于学术入门者如何建立据点打好基础,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既要细读标准的历史著作,又要阅读序列的学术原典;一种则认为可以直接从阅读原典开始,历史著作无不带有史家的见解,会影响自己的看法。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哲学史无用,研究哲学最好读哲学原著。当年我研修西方美学,正阅读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我的老师就要我直接阅读朱光潜开列的“重要美学名著”。

其实,“面”与“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面”是“点”的前提,没有“面”就找不到“点”,也难以达到对“点”的深入。因此,进入一个历史领域,首先应当细读几部历史,形成一

① 张之洞:《轺轩语》(一),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七十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0页。

②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版,第1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不会是别的。”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4页。

④ 邓以蛰:“我们的理论,照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永远是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的;画史即画学,决无一句‘无的放矢’的话。”见《邓以蛰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0页。

个开阔的历史视野。罗素自己就写了一部影响很大的《西方哲学史》，而在写这部哲学史之前，他同样“读过一些标准的哲学史”^[8]。据此，张世英当时给西哲史研究生开了两部哲学史。一部是美国学者弗兰克·梯利的《哲学史》，这部书文字浅显易懂，涉及到的人物、学派比较全面，对各种思想流派的论述简明扼要。另一部是美国学者赫尔巴特·E. 库西曼的《哲学史》，这部书的特点如作者所说，是“一本以地理与文学史和政治史为根据的哲学史”，对许多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都有论述，而且条理清楚，讲解通俗。

由于我们进入的历史领域各不相同，在阅读通史的基础上，还应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进一步阅读第二个层次的历史，即断代史、分体史、学派史等等。在第二个层次的历史中，更易“抓住一个牢固的据点”，更适宜作为自己的学术领域，确立自己的学术基地。例如，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能把整个“中国文学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或“学术据点”，而应或选择一个断代，如先秦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等等，或选择一种文体，如诗歌史、小说史、戏曲史等等；史学、哲学、美学、诗学、宗教学等其他学科，无不如此。

在“面”的把握基础上，还须做到“点”的深入，即要系统阅读这一领域的学术原典。只读史著而不读原典，难以获得真切的历史感，难以领略学术真谛，也难以建立学术据点。张世英曾为西哲史研究生开列了10本“基本书目”，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简要书目”，开列了18位作者的20种著作，作为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其中又圈出4种最重要的书，即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亚里斯多德《诗学》、康德《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美学》。同样，中国哲学史和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西方文艺理论史，以及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等等，各有各的作为基本训练的基本书目。这些著作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作，是“进入一个领域”不可不读的学术经典。

抓住一位大家：突出学术重心，形成学术专长

“抓住一位大家”是第二步，就是在你进入的学术领域中，集中精力抓住一位学术大家，研究一位大家，从而突出学术重心，形成学术专长。这对哲学、美学、文艺学等理论性学科而言，尤为重要。在这些学科中，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往往是一家思想的研究；而对一家思想的研究，也是形成你的思想个性和学术个性的开端。

（一）为什么要抓住一位大家？

“抓住一位大家”的实质，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接着讲”。1937年，冯友兰在《论民族哲学》中对“接着讲”作了深入的阐释。细绎全文，所谓“接着讲”，至少包含三层意思。

首先，讲哲学都是接着“哲学史”讲的，即使一个哲学家完全不赞同以前的哲学，即使他所讲的哲学完全与以前的哲学不同，但他也不能离开哲学史来讲哲学。他的哲学对于以前的哲学必有批评，必有反对。

其次，他的哲学不能接着空泛的哲学史，而必须接着某一“民族的哲学史”，他的哲学如接着某一民族的哲学史，他的哲学即可以是某一民族的民族哲学。

再次，所谓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哲学，事实上即是接着某民族以前的“大哲学家”的哲学讲哲学。因为，某民族的大哲学家，往往是某民族的精神方面底领导者。“一个哲学家，接着以前底大哲学家的哲学讲哲学，其工作是旧日所谓‘上继往圣，下开来学’。”^[9]

简言之，哲学家的“接着讲”，首先是接着哲学史讲，其次是接着民族的哲学史讲，最终是接着民族的大哲学家讲。其实，哲学研究是如此，文学研究、史学研究、美学研究，一切人文学科的理论研究，何尝不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抓住一位大家”的原因所在。

除了“接着讲”最终是“接着大家讲”这一基本原因之外，“抓住一位大家”尚有其他意义，概而言之，约为三点：一是向大家学习治学方法，掌握学术门径；二是从大家身上发现自我，形成学术个性；三是在大家身上体验学问境界，确立学术使命感。严羽《沧浪诗话》有曰：“学

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① 学诗如此,学术同样如此。只有抓住一位大家,向一流大家看齐,才可能具有大家的眼光,确立大家的境界,做出一流的学问。

(二) 如何选择一位大家?

英国诗人柯尔律治有句名言:“一个人生来不是柏拉图派,就是亚里斯多德派。”^[10]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也有句名言:“对欧洲哲学传统的最保险的一般定性莫过于:它不过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的注释。”^[11] 这两句话前后相续而交相辉映,同时又深刻揭示了人文学术抓住一位大家的奥秘之所在。

如果说在西方,人们生来不是柏拉图派,就是亚里斯多德派;那么在中国,我们生来不是孔孟派,就是老庄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全面东进,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海德格尔等等,一直成为中国学者首要的研读对象。以20世纪中国哲学与美学为例,王国维、宗白华、李泽厚的学术生涯是从研读康德开始的;贺麟、邓以蛰、张世英的学术研究则更多地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或从黑格尔起步的。

今天我们如何选择入门大家?人文学科的分支是多种多样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等。每个学科各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大家。因此,不同学科所选择的大家是各不相同的。不过,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又是彼此系连,交互映发,相互关联的。因此,衡量和选择学术大家的标准具有某种相通性。大致说来,以下两点可供参考:一是具有学术原创性的“轴心期”思想家;二是具有学术集大成性的“终结期”的思想家。如果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建议侧重于前者,那么台湾思想家韦政通的经验侧重于后者。

雅斯贝尔斯倡导人们过一种“哲学式生活方式”:“不要遗忘,而要在内心有所吸取;不要回避,而要在内心持之以恒;不要得过且过,而要自我澄明,这就是哲学式生活方式。”^{[12]349} 一个青年要获得“哲学式生活方式”,就需要进行系统的哲学训练,哲学训练则需要从研究大哲学家开始。针对选择的困惑,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青年人想必希望得到一个建议,即他应当选择哪位哲学家。但这种选择必须由每个人自己来做。人们只能向他做示范,提醒他注意。选择是本质性的抉择,它可能是经过摸索性尝试后做出的,也可能是经过多年后扩大了选择的范围之后做出的。尽管如此,建议还是有的。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建议是,应当研究柏拉图与康德,以便认识所有实质性的东西。我同意这一建议。^{[12]384}

雅斯贝尔斯的“建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自我选择的重要性。“选择是本质性的抉择”,与“吸引”有本质的区别:“被有魅力的读物所吸引,则不是在做选择,如在叔本华与尼采那里就会这样。选择意味着调动一切可支配的手段来做研究。这意味着从哲学史的一次伟大现象中深入到全部哲学史中去。”^{[12]384-385} 这对“选择”的本质性作了精辟阐释;二是从“轴心时代”的学说出发,特别强调具有学术原创性的“轴心期”思想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13] 作为轴心时代精神文化的代表,柏拉图达到了思想的顶峰,人们无法在思维中超过他。“研究柏拉图,就同研究康德一样,人们不是在学习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在做亲身的哲学沉思。后来的思想家如何,就表现在他如何理解柏拉图之中。”^{[12]372} 上述两点,对我们认识选择的意义和选择入门大家,极富启示意义。

韦政通是当代著名中国思想史家,他的学术生涯从荀子研究起家,《荀子与古代哲学》是其学术奠基作。作为专攻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在先秦诸子中,他为什么不从孔孟老庄入手,而是选择后世争议颇多的荀子?韦政通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多年后,他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认为,一个青年若决心在学术方面求发展,选择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对他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必要的的一个步骤。那么究竟应该选择哪一家?他认为:

^① 唐太宗《帝范后序》曰:“当择哲主为师,毋以吾前为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只为其下。”(《全唐文》卷十)严羽化治道为诗道。

“初步的选择，必须力求符合两点：第一要难；第二要繁。”^{[14]38}正是根据这一原则，他把荀子作为自己的入门对象和学术重心。首先，他认为在中国学术思想传统里，比较符合这两点的哲学家，古代有荀子，后代有朱熹。“他们都是百川归海式的哲学家，不但持载丰富，思考面广，且有独特的方法和系统。”^{[14]38}所谓“百川归海”“持载丰富”，就是集大成者。其次，“一个哲学家地位的树立，主要在能把前人的思想予以新的综合，同时经由批判或转化的过程，发展出自己的创见和独特的系统。”^{[14]39}从这个意义上，在先秦七子中，荀子和孟子都是重要的代表。不过在思想的来源上，孟子比较单纯，荀子就复杂得多。因此，只要能对荀子加以彻底的研究，就能一步步地走向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全体。再次，一个难以理解的思想系统，最能切实磨练研究者的理解能力。重要的哲学家了解起来几乎没有不困难的，但重要与繁重之间却不一定成正比，对初次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应该“宁繁毋略”，繁重的工作最足以训练我们的耐心和决心。

据说，在哈佛，博士资格考试的压轴难题，是要学生列举一串本学科最具权威的精神导师，对其学术思想作精要的比较批评，进而对学科的发展前景和突破方向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具有学术原创性的“轴心期”思想家和具有学术集大成性的“终结期”的思想家，正是每一学科领域中最具权威性的精神导师。

（三）如何抓住一位大家？

要真正抓住一位大家，就要细心阅读这位大家的全部著述。如何读？一读全集，二读评传，三读学术自述。

如何读全集？据我的经验，先做论著编年，以见出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再做论著类编，以见出学术探索的不同领域；然后在阅读全集的基础上精读代表作，以把握大家学术思想的核心之所在。如果说论著编年是历时性阅读，论著类编是共时性阅读，那么在此基础上精读代表作，就可能由面到点准确把握学者的理论核心和思想精髓。说出一个不甚大的秘密，朱光潜一生坚守的美学观，蕴涵在《文艺心理学》的“什么是美”这一章中；宗白华一生的美学思想，浓缩在三易其稿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是钱锺书文学思想的秘密诞生地；1962年发表的《美学三题

议》，则是李泽厚哲学美学万变不离其宗的起始点。

欲知其文，不知其人，可乎？要读通全集，必须阅读学者的学术评传。读评传不是读那种轻松而有魅力的逸闻趣事，而是读忠实原著严肃认真的“学术评传”。英国学者 W. D. 罗斯的《亚里斯多德》就是这样的一本理想的学术评传。作者严格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忠实地论述他的哲学特点，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亚里斯多德思想形成的背景，而且可以获得亚里斯多德思想的全貌。

此外，必须细读学者的学术自述。从王国维的《三十自序》到冯友兰的《三松堂自述》，从朱光潜的《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到王元化的《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无不细述了各自的学术渊源、学术动机、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学术追求和学术理想。意图不等于结果，自述不等于学术。但学者们基于深刻反思的学术自述，对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无疑具有最直接的帮助。其中，最为值得重视的是学术动机的阐述。作家有创作动机，学者有学术动机。没有动机就没有行动，更不会有持续的学术追求。因此，从学术动机和学术情结的追问入手，从发生学角度揭示学术体系和学术思想形成的主体动因，是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视角和方法。

精读一部经典：训练学术思维，发现学术问题

经典是学术的起点。走向学者之路，就是叩问经典的学术旅程。在进入一个领域、抓住一位大家的基础上，应集中全副精力，精读一部经典。

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无不始于精读一部经典，而后由此登堂入室。青年王国维曾四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年王元化曾三读黑格尔《小逻辑》，朱光潜美学始于精读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宗白华艺术学始于钻研玛克斯·德索的《美学与艺术理论》，孙康宜欧美文学研究受惠于“细读”《圣经》，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研究得力于“苦读”《荀子》。

精读一部经典，并非只读一部经典。我们不会忘记在《基督山伯爵》中，大仲马借法利亚长老对邓蒂斯说的一段话：“在我罗马的书房里，

我将近有五千本书。但把它们读了许多遍后,我发现,一个人只要有一百五十本精选过的书,对人类一切知识都可以齐备了,至少是够用或把应该所知道的都知道了。”^[15]这虽是小说人物的话,却不是“小说家言”。一个人真的精读了150本精选过的书,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像法利亚长老那样渊博的学者。更为重要的是,如胡适所说,“多读书才能读懂书”^[16]。读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只有多读书才能读懂书。王安石对曾子固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此之谓。精读一部经典,只有在多读书的基础上才能读懂。

(一) 何谓“一部经典”?

“一部经典”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某一学科领域中的奠基性著作;二是指作为研究重点的那位大家的经典之作;三是指跨学科相邻专业的经典著作。学科领域中的奠基之作,往往凝聚着几代学人的学术智慧;一位大家的经典之作,无不是其毕生心血的学术结晶;跨学科的学术经典,可以成为促进原创思想的“支援意识”。在进入一个领域、抓住一位大家的基础上,就应当精读这样的一部经典。

(二) 为什么要精读一部经典?

精读“一部经典”的意义何在?一言以蔽之,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宋代学者郑樵有“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之说,其《通志》有曰:“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这段话内涵丰富,而所谓“人守其学,学守其书”,换言之,就是“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雅斯贝尔斯对此曾有精辟的阐述:“一部伟大著作包括了一切,研究一部著作,就是在研究哲学的整个王国。深入地研究一部高水平的毕生之作,我就获得了一个中心点,借此澄清各个方面。研究这部著作,会联系起一切。”^{[12]384}经典的这种涵盖性和辐射性,是“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的根本所在。

具体地说,精读经典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思维训练的有效途径。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博士生培养,最根本的是原创能力的培养。培养原创能力的途径,不是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使之成为一个对几件事情知道很多的“学

者”,而使他在学术个性的形成期具备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探究能力。然而,我们只能“在哲学中学习哲学,在思维中训练思维”;换言之,精读有深度、浓度与涵盖广的经典巨著,对经典的思想意义作深入的研读与探讨,是训练原创性思维的最有效的途径。王元化回忆自己“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时坦承:“如果说我也有一些较严格的哲学训练,那就是几次认真阅读黑格尔《小逻辑》为我打下了基础。”^[17]

其次,发现自己的学术问题。精读经典是训练原创能力的有效途径,而培育原创能力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原创性的学术问题。歌德说得好:“真正的艺术品包含着自已的美学理论,并提出了让人们藉以判断其优劣的标准。”^[18]确实,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又是根据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这一本原性范例建立起来的。不朽的学术经典的精神意义,如同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无穷无尽。作品中所包含的内容远比作者本人所了解的还多。虽然说在任何一种深刻的思想中都有思想者无可忽略的结论,但在伟大的学术经典中,蕴涵着无穷无尽的内容,它就是完整性本身。因此,你只要朝着他指引的方向钻研下去,绝对不会空手而归。

孙康宜细读麦尔维尔的《白鲸》,发掘出被前人忽略的独特内涵,即不是讨论“亚哈为何把一个捕鲸之旅转为个人的复仇之旅的心理因素和前因后果”,而是“把解读该小说的重点放在流浪者以实马利的个人救赎上”,从而完成了一部见解独到的学士论文。韦政通苦读《荀子》,则有“四大获益”,并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基础:“(1)培养了我阅读古书的能力。(2)使我知道如何做注疏的工作,并真正了解注疏体的功能与缺陷。(3)使我注意到近人整理诸子的方法。(4)使我以荀子为中心,去通过先秦各家的思想;并把荀子的思想和各家相关的部分一一较量。”^[19]从《荀子与古代哲学》到《先秦七大哲学家研究》再到《中国思想史》,韦政通的学术旅程,为“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实例。

再次,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如果说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在创造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那么学者的学术个性则是在阅读、思考、研究中逐渐形成的。经典阅读往往是一个起始点。面对一个思想

个性鲜明而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人们常常问这样一个问题：“对你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影响最大的是哪几部书？”一个学者的精神大厦是由一系列被他读透的学术经典建造起来，一个学者的学术个性也是由其浸润其中的学术经典熏陶而成的。一般地说，第一部精读的经典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会像一块“磁石”，不断吸引相关的著作，从而建构学者的知识结构，形成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专长。

（三）如何精读经典？

一要“比慢”，二要“细读”。“比慢精神”是林毓生提出来的。针对近年来学界“才子太多”“文化明星”太多的喧闹现象，林先生认为，中国人文建设要想取得切实的进展，必须提倡一种“比慢精神”：“比慢不是比懒，是在心情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用适合自己的速度，走自己所要走的路……‘比慢精神’是成就感与真正的虚心辩证地交融以后所得到的一种精神。”^[20]林毓生倡导的“比慢精神”，与古代学者崇尚的“居敬状态”是根本一致的。宋人黄勉斋论朱熹治学有曰：“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其实，这种“居敬状态”也正是朱熹自己所强调的。朱熹说：“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21]在朱熹看来，“敬”是贯彻于道德活动与求知活动中的共同的精神状态。而求知活动中的“居敬”状态，就是要以科学态度尊重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做客观的认定，并随着对象的转折而转折，随着其思想的展开而展开，以穷究其自身所内涵的全部复杂性。就经典的阅读来说，首先就是要“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

如果说，王国维四年四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是“比慢精神”和“居敬状态”在中国学者中的典型一例；那么，卢梭的阅读态度可以说是此种精神状态在西方学者中的生动体现。卢梭说：“我每读一个作者的著作时，就拿定主意，完全接受并遵从作者本人的思想，既不掺入我自己的或他人的见解，也不和作者争论。我这样想：‘先在我的头脑中储存一些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论点明确就行，等我的头脑里已经装得相当满以后，再加以比较和选择。’”^[22]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极为有效。几年以

后，卢梭不仅储备了丰富的学识，而且足以使他独立思考而无求助于他人了。

“比慢”是为了“细读”。如何“细读”？如何对学术经典作学术性细读？一是要仔细剖析文本的微观结构，二是进而对文本作多维的宏观考察。只有剖析了著作的思维结构，才能把握经典的思想精髓。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犹如一个文学家的文章，必定有其依循主题所展开的结构。读者只有把握到了他的结构，才可能把握到他的思想。因此所谓“细读”，就须仔细地读，一字一字地读，一句一句地读，分清段落，理清线索，最终把握著者思想的运行，把握著作思维的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著作的显性结构与中国著作的隐形结构明显不同，因而研读时也有难易之别。徐复观根据自己的学术经验，对此作过精彩的比较分析。他指出，西方思想家以思辨为主，思辨的本身必须形成一个逻辑的结构，其著作的展开即是其思想的展开，这就使读者较为容易把握。与之相反，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有意识地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思想的结构，常常是把他们的中心论点分散在许多文字单元之中。如果说前者是“理论真理”，那么后者则是“事实真理”。当然，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经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而当生活体验经过了反省与提炼而将其说出时，也必然会显现出一种合于逻辑的结构。这也可以说是“事实真理”与“理论真理”的一致点和接合点。“但这种结构，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都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地显现出来，是较之研究西方思想史更为困难的任务。”^[23]因此之故，研读中国古代学术经典，也是较之研读西方学术经典更为困难。

在剖析了文本的微观结构，把握了经典的理论内涵之后，还应对经典作多角度的宏观考察。具体地说，有三个基本角度：一是渊源探寻，即探寻经典产生的学术背景和思想资源；二是历史考察，即考察经典在同一文化传统中的传播与影响；三是文化比较，即比较经典在异质文化传统中的异同关系。而文本解读、渊源探寻、历史考察和文化比较，正构成了经典细读的四个角度或经典研究的四维结构。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例，如果说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是“文本解读”，吕武志的

《魏晋文论与文心雕龙》(台北乐学书局2006年)是“渊源探寻”,张少康主编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是“历史考察”,那么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则颇有“文化比较”的意味了。由此可见,只要创造性地遵循经典细读的四条思路,不仅可以训练学术思维,发现学术问题,而且确实可以形成学术个性,成就一门学问。

钻透一个问题:形成学术课题,力求学术创新

一个真正的学术论题诞生之时,便是一个初步的学术个性形成之日。这个学术论题应当源自于你进入的一个学术领域、你抓住的一位学术大家、你精读的一部学术经典。这样的问题,便是一个有深厚学术基础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足以开出一个新领域的学术课题。

(一)为什么要“钻透一个问题”?

这首先是“教”与“学”的需要。对导师来说,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必须从“钻透一个问题”入手;对于学生来说,一篇学位论文就是对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没有提问,就没有学问。谁想思考,谁就必须提问。然而,提问谈何容易?事实上,提出问题比答复问题更困难。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入学最初常常处于“没有问题”的烦恼之中。在此种情况下,只有静下心来,按照“进入一个领域、抓住一位大家、精读一部经典”的学术步骤,一步一个脚印,自然会水到渠成地“提出一个问题”。

学生的学术训练须从一个问题入手,学者的终生学问往往以一个问题为中心,这是“钻透一个问题”更深层的意义。欧阳子在《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研析与索隐》中认为,白先勇的整部《台北人》讲的都是“时间”——过去与现在。白先勇表示赞同:“其实,我从开始写作起以至现在,也许就只讲了那么一点”;并进而发挥道:“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白写了。”^[24]同样,莫言也曾提出“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25]的观点,与白先勇的“一个作家一辈子只在重复两三句话”的说法,可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如果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只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那么一个哲学家一生往往只能说出“一个主题”;二者差别或许仅仅在于,前者是感性生命的文学化,后者是理性生命的学理化。柏格森在《哲学直觉》中说:“每个伟大的哲学家只能说出一个主题,而且通常只是努力表达它而已。这个最重要的主题总是十分简单的,但哲学家一直只在它周围环绕,并用各种繁复的结构来遮掩它,最终不能使它昭明,因此,得等待他的读者和评论家来完成这个艰辛的任务。”^[26]这是有根据的。以西方美学为例,“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是亚里士多德说出的一个主题;“美是形式的自由直观”是康德说出的一个主题;“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是黑格尔说出的一个主题;“艺术是意味的形式”是克乃夫·贝尔说出的一个主题;“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是苏珊·朗格说出的一个主题。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到黑格尔《美学》,从贝尔《艺术》到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无不环绕一个主题展开自己的理论体系。

由此看来,“钻透一个问题”,既可能是你作为学生的学术起点,也可能是你作为学者的学术归宿。这一切取决于你所提出的一个问题的精神力度,也取决于你所钻透的一个问题的思想深度。

(二)问题是学术的中心

问题的出现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而问题的决定则是通向知识之路。因此,问题的价值决定着学术成果的价值。如何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不仅对刚刚进入学术领域的研究生是个困难问题,对一个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成熟学者也并非轻而易举。不过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论题,不可能来自个人的闭门苦思,也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指点口授,而是源于你对特定的学术领域的长期关注和系统研究,源于你潜心研究和长期积累后的学术领悟和学术发现。对于研究生来说,要想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在遵循上述学术步骤的同时,尚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提问的主体应有必要的学术准备;二是问题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学术途径。

首先,提问主体应有必要的学术准备。学术问题的价值源于你对学科深入的程度,没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和特定的学术准备,是不可能提出学术问题的。初学者常常陷入“没有问题”的烦

恼，其原因也就在于此。而从进入学术领域到形成学术新见，大致要经历如下四步：一是理解掌握经典的理论知识；二是修正完善前人的理论观点；三是发现提出新颖独到的理论见解；四是创立建构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在这四步之中，“理解掌握经典的理论知识”的第一步，最为重要。缺乏深厚广博的“经典常识”，你所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你自己的“常识问题”。当下学界常见的“重复研究”和“学术垃圾”，研究者缺乏“经典常识”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学术问题的发现有一定的学术途径。从前人的学术经验看，发现学术问题的途径大致有四条。

一是在经典细读中发现问题。孙康宜的“叩问经典的学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她的导师 Anne Cochran 的治学原则，对我们同样有极大的教益：“你要养成细读的习惯，就会终身受用不尽。只有通过细读，你才可能在一本书中找出从前人没看出来的意义。细读是一种纯属个人的阅读经验，是你自己找寻思考人生意义的好机会。凡是通过细读而获得的灵感是属于你自己的财产，是别人偷不去的。”确实，作为心灵的智慧和学术的灵感，你所真正发现的，不是别人给你介绍和提供的，而是你在经典的慢读细思中悟到的。

二是在学术热点中发现问题。当年，青年李泽厚之所以能在美学界脱颖而出，其美学观能与朱光潜、蔡仪鼎足而三，与当时“美学大讨论”提供的学术机遇密不可分。李泽厚自述：“走进这个领域的盲目性似乎不太多：自己从小喜欢文学；中学时代对心理学、哲学又有浓厚兴趣；刚入大学时候就读了好些美学书，并且积累了某种看法。所以一九五六年遇上美学讨论，也就很自然地参加了进去。”^[27]机遇给了有准备的人，有准备的人抓住了机遇，又抓准了问题，成功就不言而喻了。无论哪一个学术领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学术热点。你若能潜心深入这些学术热点，可以引发你的学术兴趣，激活你的学术思考，最终发现属于你自己的学术问题。

三是在相互照明中发现问题。这是钱锺书著作的学术魅力之所在，也是钱锺书发现学术问题的方法论启示之所在。从《谈艺录》《管锥编》到《七锥集》，钱锺书无不在中西文化的“相互

照明”中发现问题，在“相互照明”中阐释问题，从而使他的著作成为一面瑰丽无比的“一座中国式的魔镜”^[28]。比较，唯有比较，才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比较既是学术评价的不二法门，也是学术发现的强大动力。巴赫金说得好：“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一种文化只有在他种文化的视野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29]当我们思考学术问题时，在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保持一种外位性，对深入的学术理解和独到的学术发现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时虽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的原因之所在。

四是在自我人生体验中发现问题。人文学科的问题说到底无不是人生问题。文学是人学，哲学、美学、历史学同样是人学。你的体验只要是源自生命本身的体验，就是天下人的体验；你的问题只要是发乎灵魂深处的问题，就是天下人的问题。换言之，当你从人类的角度抒写自己的痛苦时，你就是诗人了；当你从人类的角度反思自己的困惑时，你就是哲人了。英国著名传记作家鲍斯维尔说：“我最喜欢谈论的题材是我自己。”这句话在人文学科研究中是有普遍意义的。在人文学术的研究中，客观的科学精神和主观的生命体验难以绝然二分；相反，研究者的生命体验往往会深化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发现。诚如邓晓芒所说：“我钻入了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专业，但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文学经验，而是用这些体验来深入理解康德黑格尔等等思想家们的心灵。很幸运，这些德国哲人的心灵正好也饱含着人生体验，常常能够与我的体验有灵犀相通。”^[30]随着学术年龄和人生历练的增加，人生体验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三）如何“钻透”一个学术问题？

发现学术问题是进入学术研究的基础，钻透学术问题则是取得学术成果的关键。如何“钻透”一个学术问题？如何使一个抽象的问题获得丰满的血肉，获得清晰的思路，得到深入具体的解答？不妨提出四点建议。

其一，追问问题的学术价值。当你发现了自己的学术问题之后，不要匆忙着手，下笔千言，而应当冷静地追问一下问题的学术价值。追问是一种科学态度，只有通过冷静的追问，确认了问题的正当性和经典性，研究才不致徒费精力。论题的追问可以从多方面着眼：如，这个问题是真

问题还是假问题?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是深问题还是浅问题?是前沿性问题还是淘汰的问题?在上述四问中,确认“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是最为重要的。在学术研究中,被假问题所误的现象并不少见,尽管这在学术研究中难以避免,但在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中必须避免。在学术追问过程中,离不开“导师”的指导,而对学术论题作出严格的学术判断和学术检验,正是研究生导师承担的主要职责之一。

其二,确定论题的适当范围。如果说追问问题的学术价值是质的考虑,以确认问题的经典性;那么确定论题的适当范围则是量的规定,使论题具有可操作性。对于一篇学位论文来说,宁可“小题大做”而切忌“大题小做”。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告诫值得记取:“毫无疑问,得到最可靠的成果的是范围最狭小的问题。问题的概括性越强,成果的可靠性就随之而越弱。”^[31]“小题大做”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所确定的论题就是一个具体明确的“小题目”。于是,把材料搞得扎扎实实,把问题想得清清楚楚,集中精力作深度开掘,力求在个别中发现普遍意义,在具体中探寻理论价值,以收“小中见大”之功。二是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学术构想,然后从中选取一个问题或个案作深入研究。这可以说是一种“由点及面”的学术策略。在研究过程中同样要作深度开掘,最终达到“点面俱深”之效。

其三,梳理问题的研究历史。所谓梳理问题的历史,亦即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包括考察问题的源起和发展,辨章各家观点的利弊得失,总结已有成果和存在问题等等。生命的一次性决定了文化的重叠性,百年人生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人生问题的有限性。如果说五千年文学史是百年人生情怀的咏叹史,那么五千年哲学史则是百年人生问题的反思史。人文学科的所有问题,五千年来早已被无数前人思考过了,我们所要做的只是重新加以再思考而已,即从当下现实出发的重新再思考。从“钻透”问题的角度看,梳理学术史至少有三方面意义:一是在问题史的梳理中深化对论题的思考;二是在问题史的梳理中获得资料线索和提问角度;三是在问题史的梳理中酝酿论文的逻辑结构。一言以蔽

之,考镜学术史,可以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结前人经验,吸取思想精华,继续学术的攀登。

其四,拓展问题的学术基础。梳理学术史是为了获得“钻透”问题的历史语境,拓展学术基础则是为了获得“钻透”问题的“支援意识”。英国哲学家博兰尼把人的意识区分为明显自知的“集中意识”和无法明言的“支援意识”两部分。他指出,人的创造性活动是这两种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支援意识”所发生的作用更为重要。博兰尼说:“在支援意识中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知的能力是头脑的基本力量。”^①为“钻透”问题而拓展学术基础,就在于以外位性的“支援意识”激活和深化本位性的“集中意识”,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中深化对问题的思考。具体地说,拓展问题的学术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拓展问题的理论基础,获得理解阐释的多样角度;二是拓展问题的实践基础,获得理论创新的经验前提。这里再次证明“专”与“博”不可偏废,视野狭隘,既不可能钻透问题,更不可能有创造思维。

形成双重能力:思辨能力与写作能力

缜密的思辨能力和娴熟的写作能力,是一个人文学者的基本功力,也是一个人文学者的标志。走向学者之路的终极目标,不只是完成一篇学位论文,而应通过一步步的学术训练,形成思辨和写作的双重能力,成为一个有学术个性的成熟学者。

从学术传统看,中西学者的学术思维有明显差异。借用王国维话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32]西方学者的“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与中国学者的实用理性和诗性表达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强调学术概念的明晰性和学术思维的逻辑性。思辨与表达须臾不可分离。但是,只有想得透彻才能写得明白,透彻的思辨先于明白的表达。恰如

^① 博兰尼:《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参阅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40页。

布瓦洛所说：“你心里想得透彻，你的话自然明白，表达意思的词语自然会信手拈来。”^[33]所谓思辨能力，就是熟练地运用理论语言，有序地、合乎逻辑地、层层深入地思考问题，以形成思想系统和理论体系的能力。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思辨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阐释学术问题的能力；二是建构理论体系的能力。

不同学者在阐释学术问题时，既遵循普遍的逻辑规律，又形成各自的思维习惯和思维个性。例如，著名哲学家陈康把他的“哲学方法”概括为“六个步骤”：（一）叙述现象，（二）陈述问题，（三）讨论问题，（四）检讨假设，（五）尝试解答问题，（六）进一步的探讨。然后，结合具体论文逐一说明六个步骤的特点和关联。他进而强调：“哲学思考中的主要成份是现象、问题、讨论、解答。现象是问题的源泉，问题的讨论和解答是论证。因此，问题是哲学的中心，论证是哲学的精髓。我们所学者在此。学哲学的人必须训练自己怎样分析现象，怎样陈述问题，怎样讨论问题，和怎样解答问题。”^[34]“哲学方法”是人文学科的共同方法。因此，这里所说的哲学研究方法的“六个步骤”，对文、史、哲学术问题的探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傅伟勋的诠释学方法则有所不同，他把自己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分成五个“辩证的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与“创谓”^[35]，并通过儒学经典古今诠释实例的分析，对“儒学诠释学暨思维方法的建立发展”提出了富于启示性的见解。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着眼于经典的阐释思路，陈康的“哲学方法”着眼于问题的阐释步骤，二者前后衔接，互为补充，颇具启示借鉴意义。

建构理论体系是思辨能力的更高体现，也是学术思辨的最高成就。何谓“理论体系”？简言之，体系就是概念的系统。详言之，作为体系的概念系统应有如下特点：一是要有系统性，零碎思想和判断的观点构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要经过严密论证和逻辑演绎，只有观点没有论证不能成为科学理论；三是要提出新的概念范畴，一套首尾一贯的系统的概念范畴是理论体系固有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四是要有表述和展开新概念和新范畴的理论结构，把概念范畴纳入有序的逻辑结构之中；五是要提出新的研究方法，而概念的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是三位一

体的，因此新概念和新范畴必然包含了新方法。概言之，所谓“理论体系”，就是有一套经过严密论证的新概念和新范畴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一贯性的理论系统或知识系统。尽管人文学科各领域的思辨性和体系性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建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能力是所有人文学者必备的。

那么，在“反本质”“反体系”甚嚣尘上的后现代，强调建构理论体系是否已经过时？首先，这里所说的建构体系主要是指人文学者的一种思辨能力而言；其次，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不同角度强调“科学体系”重要性的理由并没有过时。黑格尔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36]⁵⁶换言之，一种没有体系的哲学，不可能是“客观真理”，只是一种“主观心情”而已。车尔尼雪夫斯基则从思想传播的角度强调建构体系的重要性：“真理若是不纳入一种完整的体系，运用起来就不方便：谁给科学创造了体系，他就能独立使科学成为通俗易解，他的见解也将融会在群众中间传播开去。”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诗学》为例，对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美学思想在欧洲的不同影响作了比较：“亚里斯多德第一个在独立的体系中申述了美学见解，他的见解几乎统治了二千多年，可是在柏拉图那里却可以找到比他还多的关于艺术的真正伟大的思想；也许，他的理论甚至不仅比亚里斯多德深刻，而且还比他完整，然而它并没有给归纳成为体系，一直到最近还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5]¹⁸³⁻¹⁸⁴这一经典事例充分说明：谁给真理创造了体系，谁就能让真理传播人间。

问题是哲学的中心，论证是哲学的精髓；问题揭示了思想的广度，答案表明了思想的精度。一个好的表达跟一个好的想法一样宝贵。学术写作是学术思辨的自然延伸，也是思辨内容的最终实现。然而，从学术构思到学术写作、再到学术论文的最终完成，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陆机《文赋》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确实经验之谈。构思一篇论文相对来说较为容易，而要把它写出来却困难得多。为什么？刘勰《神思》曰：“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心灵中的文章构思可以是令人惊奇的，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往往难以真

正巧妙。因此,学习掌握学术论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对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据我有限的学术经验,化繁复为简约,化幽深为单纯,总结了论文写作的四条原则,不妨给青年学者作一参考。

论文的本质:对经典话题作现代阐释,使古典智慧获得现代生命。歌德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37]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对此坚信不疑。只要你潜心深入下去,就会发现你所要研究的问题,无不被前人思考过了,都只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已。然而,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老生常谈中蕴含着无限深刻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加以“再思考”,从新的背景出发再思考,从新的现实出发再思考,从新的语境出发再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绝不是一时的学术策略,而是人文学科的本质之所在。与此相联系,人文学科的学术论文,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刘熙载《艺概·文概》所概括的:“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确是要言妙道,今人的“明理之文”,依然可以归入或“阐前人所已发”、或“扩前人所未发”这两类之中;而你的“再思考”和“现代转化”,正体现在一“阐”一“扩”之中。

论文的构思:把思维的自然行程转化为论文的逻辑结构。学术问题的产生大都遵循思维的自然行程,从问题的原始发生、到问题的逐渐深化、以至论题的最后形成。但是学术论文不同于游记散文,不是叙述你的思维行程,写一篇记录思维过程的精神游记,而是要对论题作逻辑论证,写一篇论证学术命题的思辨性论文。因此,你在构思论文的时候,必须转换思路,把思维的自然秩序转化为思辨的逻辑秩序,把思维的自然行程转化为论文的逻辑结构。论文的逻辑结构有多样方式:可以是康德式的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的思路,也可以是黑格尔式的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的思路,可以是西方传统的始、叙、证、辩、结的五部曲,也可以是陈康提出的叙述现象、陈述问题、讨论问题、检讨假设、尝试解答问、进一步探讨的六部曲,等等。在多样的思路中选择最适合你论题的逻辑思路,从而对命题作出最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是论文构思的中心任务。

论证的方式:系统提问的系统回答。完成了论文的构思,就开始论文的写作,化“胸中之竹”为“手中之竹”。如何写?如何把构思好的逻辑结构,落实为写作中的论述逻辑?一言以蔽之,即系统提问的系统回答。首先,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系统提问”,二是“系统回答”。这两层意思落实为论文的两大部分:“系统提问”是将有序的标题构成论文的框架,“系统回答”是通过有序的论证构成论文的内容。一篇论文的整体框架和全部内容,就是“系统提问的系统回答”。其次,论文的每一个逻辑层次,同样应是系统提问的系统回答。一篇论文分若干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若干层次。论文每一个逻辑层次的论述,严格遵循系统提问系统回答的方式展开,整篇论文就会形成一个严谨缜密、层次推进、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黑格尔说:“哲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的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这里面每一个圆圈都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的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36]这种逻辑的严密性是什么时候都必须追求的;而系统提问的系统回答的论述方式,可以保证论文整体的严谨缜密,浑然一体。

论述的深度:论点的精辟独到和论证的三重联想。一篇好论文不仅应有严密的逻辑,还应有意识到的学术深度。何谓学术深度?所谓学术深度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即论点的深度和论述的深度。论点的深度就是观点的精辟独到而富于创造性。这来自学者深厚广博的积累和沉潜反复的思虑,最终能将众人皆有而未曾说出的思想一语道破。精辟而深刻的思想,犹如划破夜空的一道闪光,照彻大地,直透人心。但是,论文不是格言,格言是穿越思辨的丛林之后呈现的哲学的单纯,论文则必须呈现出幽深复杂的思辨过程,对论点作深入论证,从学理上征服人心。根据前人的经验,论述的深度无非通过论证的三重联想来实现:一是历史联想,即通过历史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的理论观念的论证以达到历史的深度;二是现实联想,即通过现实的实践经验和现代的学术理念的论证以达到现实的深度;三是比较阐释,即在中西比较中阐明论题的民族独特性和人类普遍性以具有人性的深度。当然,由于学科领域的不同和学术个性的差异,不同学者追求论述深度的途径是不尽相同的。例如,王国维就在三个不

同的学术领域，创造性地运用不同的论述思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在考古学及上古史领域，“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在辽金元史及边疆地理领域，“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在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领域，“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8]247}。仔细揣摩，陈寅恪概括的“三证之法”与本文所说的“三重联想”，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相互吸取、相互补充、相互启发，以深化论述的深度。

结语：“修辞立其诚”

钱锺书说：“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育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39] 踏春的旅程，青春的伴侣可以结伴而行；研读的旅程，孤独的心灵只能独自前行。走向学者之路，是孤独而寂寞的心路，艰辛而无人喝彩。

“学者”之名，说来好听，“学者”之责，使命崇高。然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并不容易，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更非易事。学术史上的真学者，无不除了具有学者的真学识，更具有学者的真品格。所谓学者的真品格，一言以蔽之，即“修辞立其诚”：一是对学问的虔诚；二是对真理的真诚。

对学问的虔诚，就是为学术而学术，以学术为使命。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成功的起点。而从最初的“兴趣心”到最后的“使命感”，绝非一蹴而就，往往要经历艰难的“心灵五步曲”：即兴趣、渴望、意志、事业、使命。兴趣是最初的起点，渴望是内在地动力，意志是长久的毅力，事业是职业的升华，使命是以学问为生命。没有浓厚的兴趣，无以入学问之门；没有成功的渴望，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没有顽强的意志，耐不住长久的寂寞；没有事业心，对学问只是作饭碗看。只有化兴趣为渴望，以意志为支撑，化职业为事业，才可能真正做到为学术而学术，以学术为使命。走向学者之路的“心灵五步曲”，是由朴素的学术兴趣向崇高的学术信仰升华的过程。

对真理的真诚，就是唯真理之是求，脱俗谛之桎梏。陈寅恪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当今社会，如当年黑格尔所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

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精神家园之中。“士当以器识为先”，而“器识”则以自由的心灵和独立的人格为基础。面对种种诱惑与喧嚣，要想取得真正的学术成就，需要一份对真理的真诚，需要有一种唯真理之是求的精神，更需要一种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勇气。唯有永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可能脱俗谛之桎梏，唯真理之是求。陈寅恪赞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38]246} 这段荡气回肠的文字，道出了学者的尊严和学问的尊严，也道出了学者的品格与学问的真谛。

参考文献：

- [1] 费希特. 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42-43.
- [2] 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610.
- [3] 艾克曼. 歌德谈话录[M]. 朱光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48-49.
- [4] 钱锺书. 七缀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13.
- [5]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 [6] 厄尔·迈纳. 比较诗学[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7.
- [7] 张世英. 谈谈哲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写作[M]// 怎样写学术论文.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 [8]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6.
- [9] 冯友兰. 论民族哲学[M]// 南渡集.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44-51.
- [10] 朱光潜. 诗论[M]// 朱光潜全集: 第3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138.
- [11] A. N. 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54.
- [12] 雅斯贝尔斯. 哲学导论[M]// 哲学与信仰——雅斯贝尔斯哲学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13] 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4.
- [14] 韦政通. 荀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M]// 传统与现代之间.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5] 大仲马. 基督山伯爵[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185.
- [16] 胡适. 为什么读书[M]// 读书与治学.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18-19.

- [17]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21.
- [18] 约翰·格罗斯.牛津格言集[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394.
- [19] 韦政通.我怎样研究荀子——兼谈整理诸子的方法[M]//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285.
- [20]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1:33.
- [21] 王懋竑.朱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517.
- [22] 卢梭.忏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95.
- [23]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
- [24] 白先勇.树犹如此[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393.
- [25] 莫言.作家一辈子干的一件事——在京都大学的演讲(1999)[M]//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15.
- [26] 拉·克拉科夫斯基.柏格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6-7.
- [27] 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M].北京:三联书店,1986:17.
- [28] 莫妮卡.《管锥编》:一座中国式的魔镜[M]//钱锺书研究:第二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91-104.
- [29]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70.
- [30] 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2.
- [31] 昂利·拜尔.朗松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1.
- [32] 王国维.静庵文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16.
- [33] 布瓦洛.诗的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2.
- [34] 陈康.论希腊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34.
- [35] 傅伟勋.从德法之争谈到儒学现代诠释学课题[J].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4月号.
- [36]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37] 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M].程代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
- [3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 [39] 郑朝宗.钱学二题[J].厦门大学学报,1988,(3).

责任编辑:凤文学